

國族·歷史·主體

——論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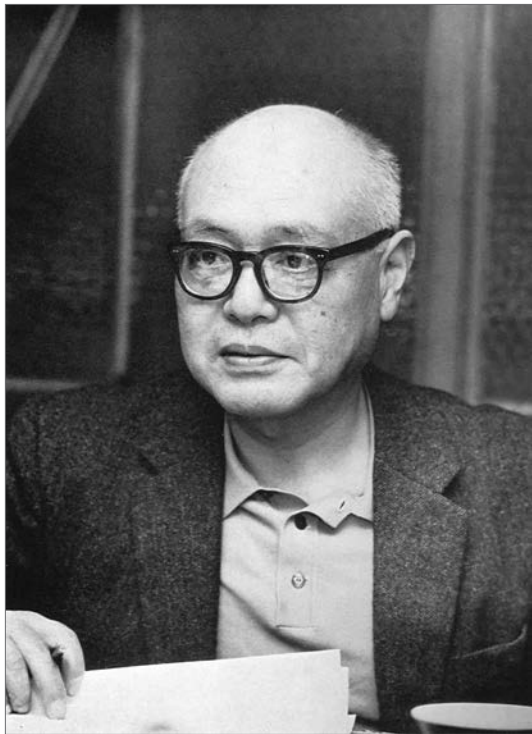
• 盧敏芝

摘要：竹內好是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奠基者。近十年來，竹內好在中國學界成為研究熱點，主要聚焦於其魯迅研究與對東亞思想文化的看法。本文通過重新閱讀其論著，從「中國」、「現代」和「文學」這三個方面探討竹內好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方法與意義，闡述其學術思想。竹內好透過中、日兩國作家作為國民精神的轉喻性修辭，引發他對兩國特別是「中國」現代性問題的省思。與此同時，他對「現代」的看法強調主體對歷史的介入，否定進化和線性發展的歷史觀，為歷史賦予了當下感和能動性。竹內好將「文學」詮釋為不斷自我生成的運動，重新定義了文學的本質，為文學與政治、內緣與外緣建立了重要橋樑。本文指出「中國」、「現代」和「文學」這三者竹內好那裏緊密呼應聯繫，互相闡釋發明，最終指向國族、歷史和主體這三個重要命題，具有濃厚的現實關懷。

關鍵詞：竹內好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日本 現代性 主體性

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在短暫的歷史中經幾輩前賢學者的努力，其內涵和外延不斷轉換和擴充。不止於作家和作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直致力建立嶄新的理論方法和跨學科的視野，外國學者尤樹其功，其中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自成體系，值得重視。本文的討論對象竹內好(1910-1977)便是戰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日本學者，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視野，在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未有減褪。

竹內好，日本長野人，1934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與同窗武田泰淳等發起組織中國文學研究會，並出版《中國文學月報》。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竹內好曾留學北京兩年。1943年底，竹內好應徵入伍，作為日軍侵華時期的文化兵到了湖南。戰後竹內好執教於東京多所大學，其中在東京



竹內好被視為日本魯迅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
(資料圖片)

都立大學人文學部任教授八年(1953-1960)，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著述和翻譯^①。竹內好畢生最重要的業績為魯迅研究，被視為日本魯迅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但其研究並不以對象本身為真正的工作目標，而是以此作為媒介致力於日本的文化思想建設。

與他晚年和身後近半世紀以來的寂寞冷落形成鮮明對照，竹內好在進入2000年後始重新受到中國、日本和世界關注，不但其著作被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②，有關竹內好的國際研討會更先後在德、中、日、美召開^③。在二十世紀冷戰過後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學界對竹內好的關注和

此前判然有別：過往研究者對竹內好的關注主要集中於他的魯迅研究^④，如今則轉移到對中日關係、日美關係、東亞思想文化史等問題的討論，關注的層面由內緣走向外緣，從文學走向更宏大的政治、歷史、文化等向度^⑤。

2005年可說是「竹內好年」。隨着收錄了《魯迅》、〈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等論著的《近代的超克》的出版，中國學界的竹內好研究在這一年開始不斷升溫。2005年9月25日，《讀書》雜誌舉辦關於竹內好的座談會^⑥；12月，上海大學召開「魯迅與竹內好」學術研討會。是年，竹內好研究者孫歌出版了專著《竹內好的悖論》。以上有關竹內好的學術討論很大程度上轉向了文化思想和國際關係的範疇，觸及到如何理解和處理日本侵略戰爭，乃至如何處理中日關係等現實問題。換言之，此時期的竹內好研究已不再局限於魯迅和文學，而是被賦予了更多貼近政治現實和「非文學」的內容。

事實上，竹內好從魯迅所引申的中國論的魅力和特色，絕非限於文學，而在於其濃厚的現實關懷和指涉，但另一位日本的中國學學者丸山昇指出其中亦不無陷阱：由於中國在竹內好的論述中並非目的而是方法，是為了進行強烈的日本批判而設定的對立面或「他者」，故倘若竹內好對日本的批判稍稍偏離要點，就該問題描述的中國圖像和中國現實的偏離便十分明顯^⑦。延伸到目前的竹內好研究中，此一「陷阱」便容易讓研究者落入主觀演繹或斷章取義的危險，離本尊愈來愈遠。故此，重讀竹內好是回應現時研究狀況最基本也最迫切的做法。

在竹內好那裏，「學術」和「現實」兩者緊密連繫，如何在兩者的論述間取得平衡並互相發明，是竹內好研究的重要課題，亦是理解竹內好學術思想的關

鍵。在魯迅研究以外，本文更關注的是竹內好作為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奠基者的身份。筆者認為，討論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最直接的方法大概是從他對「中國」、「現代」和「文學」這三個關鍵詞的論述談起。這三個看似可顧名思義的基本概念，在竹內好的演繹下，其內涵卻是與一般用法和理解相去甚遠：「中國」和「現代」兩個概念牽涉到竹內好重要的國族觀和歷史觀，而對「文學」的看法則聯繫到其深具主體性的哲學思想。換言之，透過對這三個核心概念的探討，我們不但可以了解竹內好文學研究的重點，更可以梳理出其學術體系的史學和哲學維度。三個概念的生成其實均與當時日本的歷史語境有密切關係，可見竹內好之學術與現實的連繫；三者環環緊扣，體現了竹內好思想邏輯的精密和統一。

在本文各節標題上，筆者套用竹內好「作為……的……」(…としての…)的著名語式^⑧，分為「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作為歷史觀的『現代』」和「作為獨一無二的『文學』」三個部分。藉着對竹內好的重新閱讀，本文希望為竹內好的學術體系構建一個較為完整的圖景，並重新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層意義。

一 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

「中國」是甚麼？一般而言，「中國」一詞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僅為地域、民族、語言或文化的指稱，和日常所見的「日本文學」、「西方文學」、「世界文學」等並無二致，其意義似是不辯自明。然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外國學者，竹內好具有極為強烈的個人和國族主體意識，積極探詢中國研究之於日本的終極意義。本節以「外國文學」此一較少為人注意的角度，闡述竹內好如何以「中國」作為方法。在竹內好那裏，「中國」成為日本審視自身的方法和問題意識，而「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科，則既是否定日本固有的支那學和漢學的立足點，也為「外國文學」此一學科賦予了積極的現實意義。

在竹內好的論著中，處處可見他對「國籍的問題意識」的強調。現今學界每每要求學者具備「國際性」或「國際視野」，以此作為衡量學問高下和價值的標準。何謂「國際性」？「國家」作為與「國際」相對的觀念，兩者是否不可相容？竹內好〈給年輕朋友的信——對歷史學家的要求〉(原題為〈無國籍的問題意識〉)一文即討論「國際」與「國籍」之間的悖論關係，在文章開首他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了變革而認識和為了認識而認識，難道不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嗎？」^⑨竹內好訝異於一些從事外國研究的日本學者能做出「不亞於」研究對象國的學術成果，但這對他而言並非殊可堪慰的事，反而顯示當中「沒有一絲一毫基於當日本國人立場的問題意識」^⑩。竹內好批評這種做法只是「為了認識而認識」，喪失了本國立場的問題意識，與生活和民眾毫不相干，這種東西談不上是「學問」，而是墮落為經院派的「學術」^⑪。

相對而言，竹內好追求的是「為了變革而認識」、具有本國立場的問題意識，對生存有所詰問，這才是他心目中具有終極意義和精神的「學問」。在此，竹內好點出他對學問的兩大要求：一是「國籍性」；二是「生存的追問」，而兩者的共通點均在於對「主體」的追求。竹內好的這個立場自然與他對日本漢學和支那學的否定密切相關，他認為漢學和支那學同樣作為中國研究，缺乏日本作為主體的「國籍的問題意識」，沒有發揮外國研究之於本國研究的動能，因此是脫離生活，並缺乏人生熱情、開放和論爭的精神，這樣的學術是靜止的、絕對的、畏懼變化的，呈現出「自我」和「他者」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

正是出於對漢學和支那學的否定立場，竹內好在1934年創立中國文學研究會，建立起獨立於漢學和支那學之外的「中國現代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廢刊與我〉一文中，竹內好詳細地談到他在對待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時所採取的態度和立場^⑫：

以自我保存為前提，因而預設研究對象的存在，這種外國文學的研究態度……失去了意義。對於歷史的創造者而言，世界應該在內部自行催生出來，不應該是從外面被強加的。外國文學必須內在於日本文學。使外國文學內在於日本文學的行為，就是超越日本文學、超越外國文學、不斷把新的自我推向世界文學的行為。反過來說，把外國文學作為外國文學來處理，會使外國文學變得無可理解。為了理解外國文學，必須超越外國文學。必須超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不能滿足於單純的說明，自己必須變成自己說明的對象。為使自己變成自己所說明的對象，自己必須首先不再是自己。日本文學只有通過否定日本文學本身，才能使得外國文學存活於自己的內部。這才是終極意義上的理解。亦即，外國文學研究必須被轉換為日本文學的自我否定。

這段文字極為自覺和精要地說明竹內好對待外國文學的態度，整段文字的重點在於「超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在竹內好的不同文章中，其核心思想往往體現於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反覆來回建立論述，甚至往往是透過「他者」去述說「自我」。由於終極目的不在「他者」，故「把外國文學作為外國文學來處理」對本國是毫無意義的，也失去理解的可能；由於終極目的在於「自我」，故「外國文學必須內在於日本文學」，而這個行為最終可達致「超越日本文學、超越外國文學、不斷把新的自我推向世界文學」。在這裏，「他者」之於「自我」並非對立或仿效的對象，因此這種關係是「超越自我和他者的關係」，透過「他者」的述說，最終是希望成就「在內部自行催生」而非「從外面被強加的」新的「自我」，在對照「他者」而進行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過程中，使「他者」存活於「自我」的內部。

這段文字的表述容或複雜，卻是竹內好的悖論式思想的重要核心。若我們參照竹內好如何進行比較文學的論述，即可明白當中的運作邏輯。一般來

說，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目的是為了探尋外國文學如何影響本國作家，或本國作家如何接受外國文學，亦即影響研究或接受研究，目的是了解兩國文學之間互相溝通交流的情況。研究者主要是細緻地比對作品在文字、結構、主題等方面的異同，從而得出兩者之間如何影響參照的結論。然而若回置於竹內好對「主體」的思考脈絡，則可知他是反對這種做法的，他並不關心這些技術性的具體問題，而是力圖把握住作家或作品的精神，更強調兩者之間的不同，並由此引申到更為寬廣的問題。竹內好在不同地方談到魯迅與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島崎藤村、高村光太郎等日本重要作家，但論述焦點既非影響與接受問題，亦非作品的相似性，而是作家的本質：

……魯迅和漱石在氣質和天分上有很相似的地方。……假定天分一樣的話，我以為魯迅的痛苦更為深刻，並且還可以導出《阿Q正傳》文學的世界性。兩個人都是不曾帶着作為作家的自覺出發的，而是從人的生活的基礎出發，這一點也是共通的。漱石對面向自己內部的作家有着深刻的自覺，並獲得了成功。魯迅則選擇了不可能成功的方向上的道路，殺了自身內部的作家。對漱石幸福的事，對魯迅則是不幸。在這一點上，毋寧說魯迅和想要繼承漱石的芥川相近。……漱石的人道主義和魯迅的人道主義是異質的東西。而且，從中也引出兩者幽默的不同。……除漱石的作品以外，魯迅並不看重日本文學，這是事實。但說受到影響，我以為有點言過其實。我覺得兩個人沒有類似點。……魯迅的幽默是本質的，比漱石更接近果戈理。這和漱石的幽默與梅列笛斯及哲斯脫敦〔George Meredith及Gilbert Chesterton，均為英國作家〕相近一樣^⑬。

島崎藤村從《破戒》走向《東方之門》，卻沒能從《東方之門》再走向《破戒》。……唱出「我面前無路可走」時的高村光太郎曾站到了與寫出「地上本沒有路」的魯迅同樣的起點上。然而魯迅披荊斬棘鮮血淋漓地徑直走向前去，高村則向右轉，沿着那個方向邁出了自己的步子^⑭。

和一般評論迥異，竹內好認為魯迅和夏目漱石只是在氣質和天分上有相似的地方，至於說受到夏目漱石的影響則是「言過其實」，甚至認為兩人的文學沒有類似點。雖然兩人都是「不曾帶着作為作家的自覺出發的，而是從人的生活的基礎出發」的作家，亦同樣富有人道主義和幽默感，但竹內好指出兩人被視為相似的《阿Q正傳》和《哥兒》之間的分別：象徵中國國民性的阿Q是從魯迅身上被抽取出來的，既是魯迅所憎惡、也是魯迅所摯愛的，這樣的人物的創造方法是果戈理(Nikolai Gogol)式的，這樣的作家只有在面對「絕望」、為了「抵抗」的閉塞社會中才會產生；相對而言，《哥兒》中的主人公哥兒呼喚和接受眾人的同情，它是青春的文學，內裏並沒有魯迅的「絕望」。由此竹內好引申魯迅和夏目漱石之間決定性的分別：「與其說是作為作家的天性上的差異，不如說是產生作家的社會環境的差異。」^⑮他認為夏目漱石乃至整個日本文學由於日本社會的開放，無法感應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的「不幸」命

運，但這種「幸運」亦從而導致日本文學未能獲得如《阿Q正傳》般的世界性高度，竹內好甚至斷言：「和魯迅的絕望相比，日本戰後作家的絕望是多麼無聊、虛偽！」¹⁶

至於島崎藤村和高村光太郎，因同樣在「面前無路可走」這個主題上與魯迅站在相同的起點而被納入魯迅研究的視野，但竹內好指出，島崎藤村晚年的作品《東方之門》不復存在早期作品《破戒》中所突顯的這個主題，高村光太郎則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持戰爭和日本政府，顯示了「向右轉」而非「披荊斬棘鮮血淋漓地徑直走向前去」的姿態，因而也無法和魯迅同日而語。

竹內好這番褒揚魯迅而批評日本現代作家的評論，與他的中國論和日本論並無二致，其中作家明顯是國民精神的轉喻性修辭。因此，竹內好對魯迅和日本作家如何看待外國文學（主要為俄國和東歐文學）的分析更為耐人尋味，因為當中體現了竹內好如何看待中、日兩國對西方現代化的接受。以下通過對竹內好《魯迅雜記I》中〈魯迅與二葉亭〉和〈娜拉與中國——魯迅的婦女解放論〉兩文的分析對此作出闡述：

我的印象是：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有兩重性，即抵抗歐洲的方面和接受歐洲的方面。……例如，屠格涅夫和迦爾洵幾乎是相反的，魯迅選擇了迦爾洵。當然，他也翻譯安特萊夫的作品，但在這個時候，他不是從安特萊夫所具有的近代主義中，而是從斯拉夫的東西中把握了它。……二葉亭〔日本小說家二葉亭四迷〕翻譯屠格涅夫和迦爾洵兩人的作品。他並沒有魯迅那樣的選擇意識¹⁷。

一般來說，中國文學從最初出發的時候，就一貫保持着人道主義的色彩，那是在接受外國文學方面清晰呈現出來的，不像日本那樣無所選擇；而且不喜歡拉丁系統的圓滿、完整的文學，而歡迎東歐、北歐的反抗文學¹⁸。

在以上引文中，竹內好透過分析中、日兩國對外國文學的譯介情況，更明顯地揭露出中、日兩國文學的分歧：前者是自覺的、抵抗的、與弱者共感的；後者是無意識的、放棄抵抗的、仰望強者的。顯然，這個看法早已遠超文學評論的層面，而是深入到對中、日兩國國家精神的分析，最終歸結到竹內好在〈何謂近代〉中著名的東亞現代化論述，亦即中國的「回心」型文化和日本的「轉向」型文化之上¹⁹。

換言之，從外國文學的角度分析魯迅，目的並不在闡明魯迅的文學淵源，而是作為方法引向對中國和日本本質的論述。在此可見，竹內好如何有意識地展開其獨特的「中國現代文學」論述：從「文學」分析出發，把問題引向作家與國家精神的關係（「中國」和「日本」），以及作家（或國家）對待「現代」的態度。

從比較文學的方法而論，竹內好捨棄了一般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影響或接受研究這個暗含文化程度高低的價值判斷的比較框架，而是把魯迅或中國文

學放在與日本文學平等的位置上(亦即共同作為「東亞」的一份子)來比較。建基於魯迅作為中國作家此一前提,他與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同樣面臨國家處於現代化的相近背景並接觸外來文化,竹內好由此推論出兩者態度上的差異是本國文化本質的體現。對於外國文學的迎拒,竹內好和一般比較文學學者截然不同,他「只是否定那種想要從外部強加給日本文化某些東西的意識」和「憎惡那種旁觀的態度」的經院派做法²⁰,認為這是把知識客觀化、絕對化和脫離現實,批評以國別界定研究對象的學院方式已失掉研究有效性。相對而言,竹內好更關注「抵抗」此一問題,透過論述魯迅的內在選擇,他痛切批評日本文學只懂放眼西方而不懂反躬自身,此一獨特的論調並非刻意美化中國或把中國文學抬高到較日本文學更優越的位置上,而是希望藉着言說「他者」來警醒「自我」,與其沉迷於向外攫取,不如回溯自身。

從以上分析,可見國族的問題意識在竹內好的學術思想當中的重要性,既落實到他的外國文學研究中,亦歸結到國家精神的現實意義之上。

二 作為歷史觀的「現代」

「現代」(或其日文同義詞「近代」)是甚麼?「現代性」問題自1990年代成為中外學界的研究熱點,至今相關論述仍不斷推陳出新。目前學界切入「現代性」問題的思路,多考慮以下因素:民族國家的抬頭、資本主義的興起、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科學技術和精神的重視、啟蒙思想的出現、大眾媒體的激增等,這些特徵與十五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歷史的進程相仿。毋庸諱言,「現代」一詞有其西方淵源,而中國和日本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被西方強行打開國門,始對世界格局和版圖有了重新的認識和想像,因此迎來了兩國的「現代」。自此,中、日兩國在現代化問題上或進或退,造成兩國國力之間的巨大逆轉,催生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相繼勝利後,對外擴張野心日增,演變為涵括東亞和南洋的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最後以美國介入和天皇投降告終。戰敗的屈辱對日本知識份子造成莫大震撼,此後日本的現代化問題成為竹內好學生的思想主軸。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主張全盤西化,以「脫亞入歐」作為目標,迅速投身西方陣營。一般史論皆視之為日本現代化之路的徹底成功,並以中國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作為對比。竹內好在他的名文〈何謂近代〉和著名演講〈作為方法的亞細亞〉中卻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日本對西方全盤接納、毫不猶豫的立場,導致其現代性反不及頑固保守、不斷回望遲疑,因而在改革之路上寸步難行的中國。這個觀點某程度上來自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²¹,但竹內好對此另有獨特詮釋。他認為,「抵抗的歷史便是近代化的歷史,不經過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²²。從本源來看,歐洲的所謂「現代化」正是建基於「抵抗」而完成:歐洲的現代來自於自由資本的發生、獨立平等的個體人格的建立,這種對自我的重新認識和解放,正是建基於對過去封建社會的

抵抗。在這裏，「抵抗」和「主體」有着重要的並生關係，而「現代」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環節：主體在歷史中把自我相對化，在自我否定中重新獲得自我確立的契機。

為了進一步確立自我，歐洲在抵抗過去的封建社會以後，更必須自我擴張，以完成整個現代化進程，因此其入侵東洋是必然的。歐洲的擴張，衍生出東洋的抵抗，兩者之間互相爭持。由於「現代」是由歐洲定義的，在將東洋納入世界史的過程中，歐洲確認了自己的勝利，東洋則在同樣的過程中確認了自己的失敗，而這失敗正是抵抗的結果，抵抗的持續則造成失敗感的不斷持續。在這個過程中，歐洲一步步前進，東洋則一步步後退，這個後退是伴隨着抵抗和失敗感的，而這種前進和後退則被歐洲解釋為世界史的進步、理性的勝利。從西洋衍生而來的「東洋」，其現代化之路注定波折重重，因為需要付出雙重的抵抗：對於失敗的抵抗，以及對不承認失敗或者忘卻失敗的抵抗；也即是對理性的抵抗，以及對於不承認理性之勝利的抵抗。另一方面，這種「前進—後退」的運動正好說明，所謂「先進」與「後進/落後」、「成功」與「失敗」的概念並非絕對或無限延展的，而只是存在於歷史上某個瞬間的一種相對判斷。

「瞬間」是竹內好歷史觀中的關鍵詞：「歷史並非空虛的時間形式。如果沒有無數為了自我確立而進行的殊死搏鬥的瞬間，不僅會失掉自我，而且也將失掉歷史。」²³「所謂瞬間，與其說意味着作為極限狀態的不具有延伸的歷史上之一點，不如說是歷史從那裏湧現的點（而不是歷史的擴展）。」²⁴一方面，竹內好認為歷史並非線性發展的時間長河，並非一成不變，亦不是連續的。由此，竹內好否定了由低到高的進化歷史觀，遑論先進與落後的區分；另一方面，歷史的存在由主體所賦予，只有當主體介入歷史，歷史才可能產生。歷史產生於主體在極限狀態下為了自我確立而進行殊死搏鬥的無數個時刻之中，以可能性的狀態存在於主體所作的每一個判斷、決定和行動之中，因此，歷史不存在於過去或未來的想像之中，歷史即為當下。

由上可見，竹內好對「現代」的看法取決於他對主體和歷史的重視，「現代性」並非作為被給予的東西來接受或追求的，而是在抵抗和拒絕外界乃至自我否定中自內而發地誕生；換言之，主體在對待歷史時直面自覺和積極介入的態度才是現代性的核心，現代性的精神在於自我確立。所謂「抵抗的歷史便是近代化的歷史」，因為抵抗的過程是一種不斷超越自我、產生自覺意識、具有精神意義的主體運動。由此出發，竹內好對東亞現代化作出其獨特闡釋。他着意強調中國近代對西洋的不斷抵抗，由於各種通向進步的出路都被封閉，使中國在這種極端的狀態下產生出內生性動力，從劇烈的自我否定中浴火重生，建立其「現代」。

相對而言，日本從來沒有經歷中國（或魯迅）的「痛苦」與「不幸」，卻因此注定與「現代」無緣。日本素來被認為擅長於複製先進文化，或對較已優秀的文化有某種情意結，竹內好稱這種文化結構為一種「優等生文化」；從明治時期開始則表現為熱衷於捨舊求新，勤勉學習西方新事物。竹內好對這種文化結構持負面態度，認為這樣仿如跑道外的看客般，僅是透過旁觀的眼光觀察誰勝誰敗。這種觀察得出來的結論「正確」得有如照相機，卻是因為本身沒有

參與比賽奮力奔跑之故。沿用上文所提及竹內好對歷史的看法，這種態度既是喪失主體的，同時也是非歷史的。竹內好甚至斷言，日本這種優等生文化所追求的所謂「進步」，實際上不過是奴隸的進步。這種獨特的看法，構成竹內好著名的中國「回心」型和日本「轉向」型的東亞現代化論述²⁶。

竹內好由對歷史和主體的重視引申而來的對「現代」的看法，放到文學研究著作《魯迅》中，成為對魯迅的嶄新詮釋。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性人物，魯迅一直被其他研究者標榜為「進步主義者」、「優秀的啟蒙家」、「為消除落後而拼命追趕歐洲的開明主義者」等角色²⁷，然而竹內好認為魯迅從來都不是「先覺者」，而是一位「現役文學者」²⁸。在魯迅所經歷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三個重要階段：文學革命、革命文學和民族主義運動，他都不是走在最前的領軍人物——《狂人日記》雖奠定了文學革命的里程碑，然而在他以前以理論摧毀舊道德堡壘的卻有吳虞、周作人和陳獨秀；在「革命文學論戰」和「國防文學論戰」中，魯迅均是作為與主流聲音敵對的少數者，儘管就結果而言他在兩次事件中都是成就了團結統一。和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正好相反，魯迅在每次新的運動中都比歷史落後一步。因此，竹內好指出魯迅身上「沒有思想進步這種東西」²⁹，而是始終與歷史同在，「與其認為只有魯迅才始終正確，處在中庸的位置，矯正着中國文壇的偏向，還不如認為魯迅和中國文壇共同搖擺更接近真實」³⁰。正因如此，竹內好認為魯迅並非純粹意義上的啟蒙者，而是作為終極意義的文學者（下詳）。此外，竹內好認為魯迅的出現具有改寫歷史的意義，但最重要的原因並非其對白話小說的貢獻，而是使康有為、梁啟超、嚴復、林紓、章炳麟、王國維這些孤立於歷史之外的先驅者和開拓者得以進入歷史，使他們得到歷史性的評價³¹。魯迅是作為「中間物」而存在的³²，他見證了歷史的真實，並在與歷史的不斷搏鬥中使歷史得以重寫。

竹內好對東亞現代化的獨特看法，某程度上是為了回應其當時身處的歷史環境，卻也展現了深刻的歷史穿透力，使我們對「現代」這個問題和其內涵有了重新的想像。自晚清以來，國人汲汲追求政治制度、社會風俗、物質條件等外在環境的去舊迎新，魯迅卻提出其棄醫從文的原由是，相比起國民體格的提升，國民性的改造更值得他投放終身。表象的改變可能只是皮相的、換湯不換藥，情況有如奴隸升格為奴隸主之後，也不代表社會結構會有所改變，真正的變革應該具有從內而發的徹底性。以上看法體現了竹內好充滿主體性的歷史哲學：在對主體價值的追求上，對中國的褒揚，實際上是對日本民族獨立問題的當頭棒喝。這個立場可見於竹內好戰時支持太平洋戰爭，以及戰後堅決反對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的政治取態。

在對歷史真實的追求上，竹內好反對以進化論式的歷史框架裁決過去和預言未來，是因為不希望把自己置於歷史的最高點，居高臨下地審視和評點前人的一切，而無視前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各種選擇和決斷，結果得到的只是事後孔明式的外在批判，導致歷史認識的概念化和意識形態化³³。這從竹內好對自己戰時的立場不曾作過辯護可以看到。因此，對於「現代」，竹內好始終重視當中的意識和精神如何落實到個體的層面³⁴，在他的著作中，可以充分感受到背後這種強烈的人文關懷。

三 作為獨一無二的「文學」

「文學」是甚麼？這是一個可以被無窮追問下去的問題，從其自有以來一直存在，而又言人人殊。要解答這個看似抽象的問題，竹內好認為大概有兩個方法：一、排他法，從判斷哪些不是文學來彰顯文學之所在^⑳；二、言說文學的核心價值，從而突現文學的本位。所謂「獨一無二」，既是對上述方法的詮釋，也是竹內好對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期許^㉑。本節以《魯迅》為對象，闡釋竹內好對「文學」的看法。

如上節所提及，竹內好認為魯迅是終極意義的文學者，這個結論可說是《魯迅》立意之所歸：「從根本上來說，魯迅是個文學者。沒有誰更能像魯迅那樣讓我來痛切地思考文學者這個詞的意義。」^㉒由於在引錄竹內好的文字時，總是難以省略掉一些句子，因其往往從某一細小的起點一步一步就推向了深廣的結論，因此這裏要先引錄一大段可說是竹內好對魯迅的總歸評價^㉓：

魯迅是文學者。首先是個文學者。他是啟蒙者，是學者，是政治家，但正因為他是文學者，即正因為丟掉了這些，這些才會作為表象顯現出來。他是教育者，宗教者，亦是因此之故。在他，是有着一種除了稱作文學者以外無可稱呼的根本態度的。他似乎連小說都拋棄了。他的痛苦之深，以至於深到無法把對象世界構築到小說和批評當中。《熱風》、《華蓋集》以下的接連出版的雜感集，便是這痛苦的產物。它們有一大半是論爭文字，正像《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花邊文學》等題名的由來所顯示的那樣，這些集子在本質上都是論爭集。他為表白痛苦而尋求論爭的對手。寫小說是出於痛苦，論爭也是出於痛苦。小說裏吐不盡的苦，便在論爭裏尋找傾吐的地方。在論爭中，他的對手遍及所有階層，亦遭受了來自所有階層的嘲罵。若有人看不過，對他表示同情，他會對同情者的同情態度做出激烈的反彈。這已到了類似偏執狂的程度，無可救藥了。但他所抗爭的，其實卻並非對手，而是衝着他自身當中無論如何都無可排遣的痛苦而來的。他把那痛苦從自己身上取出，放在對手身上，從而再對這被對象化了的痛苦施加打擊。他的論爭就是這樣展開的。可以說，他是在和自己孕育的「阿Q」搏鬥。因此，論爭在本質上是文學的。即，不是行為以外的東西。作家在作品內所做的，他在作品之外做了。如同批評家構築起批評的世界那樣，他通過論爭在世界之外構築了世界。他預知到了有個影子將會折磨自己。這個影子曾從內面折磨過他，但現在又被對象化在他的面前。與之戰鬥，在他那裏就是表現自我。於是他這樣做了。這是勝過一切的、第一義的文學者之路。

從上文可見，竹內好是從「態度」去定義文學的，文學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家之於作品，乃至人生的整個態度。這種態度首先是對非文學的其他東西的關懷，但同時又是摒棄。魯迅雖因其對外在現實政治和社會的關懷而同時是

啟蒙者、學者、政治家、教育者、宗教者，但他亦極力在文學中撇除這些東西，絕不讓這些東西凌駕於文學之上。因此，魯迅的文學在本質上既非功利主義、為人生的，也並非是為民族或是為愛國的，因為他從不以這些東西來支撐自己的文學。正是由於這種對文學的態度，魯迅面對自身的矛盾，最終無法繼續實踐小說創作，然而這正進一步說明魯迅是徹頭徹尾的文學者。由此，竹內好以「無」來總括魯迅文學的核心，他指出魯迅總是以千言萬語來說明話語的非存在，「文學是無用的」是魯迅的根本文學觀，但他卻為這無用的文學消磨生命^③。竹內好對「無」的更著名的論述，是對魯迅的「絕望」的解釋，魯迅是以滿腔熱情來看待黑暗，並產生絕望；對魯迅來說，只有絕望才是真實，但不久絕望也不是真實，而是虛妄。對絕望感到絕望的人，只能成為文學者，不以任何東西來支撐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歸於自己一身，這便是魯迅的「無」的精粹^④。

相對於小說和評論，竹內好更重視論爭文章在魯迅文學中的位置，如上所述，他認為魯迅的「論爭在本質上是文學的」，因為他所抗爭的並非他的對手，而是自己，故論爭並非行動本身，而是他與異化到自己之外的非我之物交鋒較量的文學舞台。魯迅從來洞悉論爭的對象不是政治本身，「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⑤，文學對政治是無力的，然而這正是文學的「無用之用」，魯迅正是「通過與政治的對決而獲得的文學的自覺」^⑥。竹內好指出^⑦：

文學對政治的無力，是由於文學自身異化了政治，並通過與政治的交鋒才如此的。游離政治的，不是文學。文學在政治中找見自己的影子，又把這影子破卻在政治裏，換句話說，就是自覺到無力，——文學走完這一過程，才成為文學。政治是行動。因此與之交鋒的也應該是行動。文學是行動，不是觀念。但這種行動，是通過對行動的異化才能成立的行動。文學不在行動之外，而在行動之中，就像一個旋轉的球的軸心，是集動於一身的極致的靜。沒有行動，便沒有文學的產生，但行動本身卻並非文學。因為文學是「餘裕的產物」。產生文學的是政治。然而，文學卻從政治中選擇出了自己。因此，革命會「變換文學的色彩」。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不是從屬關係，不是相尅關係。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學。所謂真的文學，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卻在政治裏的。可以說，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是矛盾的自我同一關係。

竹內好稱魯迅的文學為「回心之軸」^⑧，而文學本身「就像一個旋轉的球的軸心，是集動於一身極致的靜」。文學的性質並不如政治本身是行動，但也不是凝固不動的實體（如經院派的學術所認知的），而是不斷自我生成的運動。而這種文學的誕生，則端賴於文學者的自覺^⑨：

使文學者成為可能的，是某種自覺。正像使宗教者成為可能的是對於罪的自覺一樣，某種自覺是必要的。正像通過這種自覺，宗教者看到了神

一樣，他使語言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語言所支配，而反過來處在支配語言的位置上。可以說，他創造了自身的神。

這種自覺，在竹內好詮釋的魯迅中，包括對孤獨的自覺、對絕望的自覺、對罪的自覺等^{④5}，而這一切都歸根到對生活、真實的恪守：「魯迅是一個強烈的生活者，是一個徹底到骨髓的文學者。」^{④6}如前文所提及，魯迅的生命和歷史共同搖擺，這使他沒有成為先覺者而成為「現役文學者」。此外，魯迅常常在文章中虛構事件或說假話，但他的假話卻往往恪守真實，竹內好指出這是魯迅區別於很多傾吐真實的俗流文學者的原由所在^{④7}。由此，竹內好把「文學者」和「作家」作出嚴格區分，文學者具有遠比作家豐厚寬廣的心靈，而這正反映文學中主體的重要性，也正是文學源源不息的所在。

竹內好在《魯迅》中呈現出獨一無二的魯迅，同時也訴說了獨一無二的「文學」的內涵。文學是不受任何外在力量，諸如政治、民族、主義等功利因素所駕馭的，它透過排除這些外力而彰顯自己；但文學也並非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凝定不動的實體，在對主體的介入和對話中，它誕生於不斷的自我運動之上。竹內好的文學研究內涵因此比一般的作家或作品研究遠為複雜，它既包容其他因素或領域，同時又自外於這些東西之上，當中的正反辯證富有極為強烈的哲學色彩。此外，這種關注現實同時獨立自覺的形象不但是作為文學者的魯迅的金身，大概也是作為研究者的竹內好本人的投射：前者不苟同於孜孜經營文章的流俗作家，正如後者不屑於困守象牙塔內經院派的學究。

四 總結

本文通過對竹內好的重新閱讀，從「中國」、「現代」和「文學」三個方面闡述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首先，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建基於「外國文學」的前提之上，但這既非把外來資源知識化的學院派做法，亦非只關注文學源流的比較文學或影響研究，而是以國族作為問題意識，以「中國」此一「他者」作為方法引發對日本的審視。通過細讀竹內好對中、日作家的比較，本文指出竹內好如何從作品發掘作家本質的問題，並透過兩國作家作為國民精神的轉喻性修辭，引發他對兩國現代性問題的省思，從而形成獨特而影響深遠的外國文學研究和思考方法。

接着，本文分析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如何看待「現代」此一核心問題，竹內好認為現代性並非被強行施予，而是透過「抵抗」此一過程奮力爭取而得，由此推衍為否定進化和線性發展的歷史觀，強調主體對歷史的介入，為歷史賦予了當下感和能動性。竹內好把現代劃分為西方與東亞兩個版圖，並把東亞概括為中國與日本兩種對待西方的方式，並從兩國對西方現代性的抵抗和接受衍生著名的「回心」和「轉向」說，而魯迅則是中國「回心」型文化的代表，他與歷史共同搖擺，見證了歷史的真實，因此是一位「現役文學者」。

最後，本文通過竹內好的魯迅研究，指出他對「文學」的看法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打開另一路向：有別於一般認為文學應排除政治和社會因素、只着重作品的純文學觀點，竹內好則着力詮釋文學與其他因素之間既獨立又互相依存的複雜關係，從作家主體去尋找和定義文學獨一無二的本質，因此，文學並非凝固不動的實體，而是不斷自我生成的運動，由此為文學賦予生生不息的意義。

本文通過「中國」、「現代」和「文學」三個關鍵詞來分析竹內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除了希望能較為系統化地呈現竹內好的學術思想之外，並意圖藉此重新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層意義。在竹內好的學術系統中，「中國」、「現代」和「文學」這三個關鍵詞所指涉的時空坐標和學科本質最終指向國族、歷史和主體這三個具有濃厚的現實關懷的重要命題，且三者之間緊密呼應聯繫，互相闡釋發明。三個命題之間宏大卻不失細緻質感，原因在於從作家出發以小見大，從「人」的角度展現了追求這些命題中過程的顛簸、複雜與價值。由此，過去與現在從未嘗中斷，過去的世界仍與現在並存，文學研究同時折射出作家與研究者的生命與心靈，在歷史的紛攘中伴隨我們繼續追尋前行。

註釋

① 竹內好畢生從事最深入的是魯迅文學的翻譯和研究，相關代表著作包括《魯迅》（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魯迅入門》（東京：東洋書館，1953）；《魯迅雜記（新編）》（東京：勁草書房，1976）等。他也曾發表其他中國現代文學著述，如與岡崎俊夫合編的《現代中國の作家たち》（東京：和光社，1954）；《中國新文學事典》（東京：河出書房，1955）。他也有翻譯其他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參見劉半農：《賽金花》（東京：生活社，1942）；葉紹鈞：《倪煥之》（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43）；茅盾：《子夜》（東京：平凡社，1963）等。

② 竹內好著，孫歌編，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竹內好著，靳叢林編譯：《從「絕望」開始》（北京：三聯書店，2013）。

③ 自2004年起至今，中外學界共舉辦過三次竹內好國際研討會：（1）「竹內好——思考亞洲另一種近代化的思想家？」（Takeuchi Yoshimi—Thinker of a Different Modernity in East Asia?），德國海德堡大學，2004年9月6日至10日；（2）「魯迅與竹內好」，中國上海大學，2005年12月24日至25日。研討會論文集參見薛毅、孫曉忠編：《魯迅與竹內好》（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3）「日本、中國、世界——竹內好再思考和方法論的範例轉換」（日本・中國・世界—竹內好再考と方法論のバラダイム轉換—），日本愛知大學，2006年6月30日至7月1日。研討會論文集參見鶴見俊輔、加々美光行編：《無根のナショナル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內好を再考す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7）。此外，國際魯迅研討會對於竹內好亦愈加重視，如「魯迅與東亞」（Lu Xun and East Asia）國際研討會暨國際魯迅研究會第三屆學術論壇（美國哈佛大學，2013年4月5日至6日）便有多篇論文專門討論竹內好的魯迅研究。

④ 1986年，竹內好的《魯迅》經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竹內魯迅」由此正式登陸中國（參見竹內好著，李心峰譯：《魯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影響了新時期不少重要的魯迅研究著作，包括錢理群：《心靈的探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郇元寶：《魯迅六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等。

⑤ 除上述研討會主題和文集外，另可參見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吳珮蓀：《從中國反譯日本？：竹內好抗拒西方的策略》（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7）等中文著作。

⑥ 參見子安宣邦等：〈如何看待二十世紀？〉，《讀書》，2006年第2期，頁133-44。

⑦ 丸山昇：〈作為問題的30年代——從「左聯」研究、魯迅研究的角度談起〉，載丸山昇著，王俊文譯：《魯迅·革命·歷史：丸山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87。

⑧ 竹內好於1960年1月25日發表著名演講〈作為方法的亞細亞〉（〈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收入武田清子編：《思想史の方法と對象：日本と西歐》（東京：創文社，1961），頁213-40。當中，「作為方法」後面的主詞並非問題的終極目標，而是作為關聯性的媒介引發對主體否定式的建設性思考。這種獨特的思考方式深刻影響了當前的東亞研究，衍生出以下論著，參見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孫歌：〈作為方法的日本〉，《讀書》，1995年第3期，頁101-107；子安宣邦：《方法としての江戸：日本思想史と批判的視座》（東京：ベリかん社，2000）；汪暉著，村田雄二郎、小野寺史郎、砂山幸雄譯：《思想空間としての現代中國》（東京：岩波書店，2006）；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出版社，2006）等。

⑨⑩⑪ 竹內好：〈給年輕朋友的信——對歷史學家的要求〉，載《近代的超克》，頁268；269；270。

⑫⑳ 竹內好：〈《中國文學》的廢刊與我〉，載《近代的超克》，頁176-77；177。

⑬⑭⑮ 竹內好：〈《阿Q正傳》的世界性〉，載《魯迅雜記I》，收入《從「絕望」開始》，頁213-14；215；215。

⑯⑰⑱⑲⑳㉑㉒ 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載《近代的超克》，頁210-11；181-222；186；183；189；200-13；210。

⑳ 竹內好：〈魯迅與二葉亭〉，載《魯迅雜記I》，頁219。

㉑ 竹內好：〈娜拉與中國——魯迅的婦女解放論〉，載《魯迅雜記I》，頁222。

㉒ 竹內好在〈娜拉與中國〉（頁229）曾提及此。另參見子安宣邦對〈作為方法的亞細亞〉的分析。子安宣邦著，賴俐欣、林鍵麟譯：〈「亞洲」這條抵抗線的可能性：省思東亞的近代〉，《文化研究》，2008年第6期（增刊），頁58-77。

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竹內好：《魯迅》，收入《近代的超克》，頁10；11；110；81；108-109；12-13；107；53；134；45、52；107-108；52、107、8；39；13。

㊱ 竹內好：《魯迅》，頁45-70；〈何謂近代〉，頁181。

㊲ 「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參見魯迅：〈寫在《墳》後面〉，載《墳》，收入《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64。

㊳ 參見孫歌：〈在大陸語境中「翻譯」竹內好——進出政治正確的中國論述〉，《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1期（2007年3月），頁69-84。

㊴ 此一思想對另一位重要的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伊藤虎丸有深刻影響，參見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㊵ 「A之存在即是A對非A的排除。」參見竹內好：〈何謂近代〉，頁195。

㊶ 「中國文學研究會是獨一無二的。不僅在理解支那的意義上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在對現代文化進行內在批判的意義上也試圖成為獨一無二的。」參見竹內好：〈《中國文學》的廢刊與我〉，頁174。

㊷ 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載《而已集》，收入《魯迅全集》，第三卷，頁318。